



Tariff, Coinage and Economy

关税、币制与经济： 中美比较研究 (1870 ~ 1936)

蒋清宏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ariff, Coinage and Economy

关税、币制与经济： 中美比较研究 (1870 ~ 1936)

蒋清宏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税、币制与经济：中美比较研究（1870～1936）/蒋清宏著．—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7-5130-3225-4

I. ①关… II. ①蒋… III. ①关税—对比研究—中国、美国—1870～1936
②货币制度—对比研究—中国、美国—1870～1936 IV. ①F752.5②F817.123.2
③F822.1④F827.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1786 号

责任编辑：刘 江
封面设计：张国仓

责任校对：孙婷婷
责任出版：刘译文

关税、币制与经济：中美比较研究（1870～1936）

Guanshui、Bizhi yu Jingji: Zhongmei Bijiao Yanjiu

蒋清宏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 55 号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44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 刷：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960mm 1/16

版 次：2014 年 12 月第一版

字 数：240 千字

ISBN 978-7-5130-3225-4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编：100081

责编邮箱：liujiang@cnipr.com

发行传真：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15.25

印 次：201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40.00 元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导论	(1)
一、中国经济史学的方法论问题	(1)
二、近代中国宏观经济史学述评	(9)
三、近代中国货币问题研究	(13)
四、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研究	(15)
第一章 关税与经济	(17)
一、近代中国海关主权的丧失	(17)
二、中国海关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22)
三、中国近代海关内部管理机制	(31)
四、关税政策与对外贸易	(36)
五、海关行政力量的加强	(39)
六、自主关税税则的实施	(42)
七、关税政策的宏观经济效果	(55)
第二章 币制与经济：中美比较研究	(63)
一、美国币制的历史演变	(64)
二、金本位制与美国国内银价调整	(66)
三、美国确立世界金融地位	(68)
四、美国白银政策与中国银本位终结	(74)
第三章 近代中国白银通货存量考论	(88)
一、罗斯基货币供给序列存量的认定与修正	(88)
二、耿爱德白银通货存量考论	(109)

三、中国白银与美国黄金存量价值比较	(120)
第四章 近代中美白银购买力比较	(129)
一、白银购买力理论	(130)
二、汇率技术分析	(136)
三、中美货币化水平比较	(138)
四、中美货币流通速度比较	(141)
第五章 1929～1935 年中美通货供给结构性差异	(146)
一、通货存量的影响因素	(146)
二、货币需求概念和理论	(150)
三、农产品购买力长期低下导致中国农民货币需求不足	(154)
四、金融资本财政化和财政资本军事化、债务化	(157)
五、中美“银行存款—通货比率”结构性差异	(165)
六、经济危机期间中国高能货币增加基本原因分析	(169)
七、中资银行存款增加基本原因分析	(171)
第六章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经济危机悖论现象论析	(175)
一、实体经济“并不太坏”现象	(175)
二、银行存款增加是“社会财富增加”吗	(184)
三、“贸易入超减少”是经济良好表现	(192)
四、埠际贸易增加还是萎缩	(197)
附表	(204)
参考文献	(226)

导 论

由于受各种约束机制的制约，中国经济史学处于“失范”与“规范”的动态变化之中。这既有理论层面的约束，也有管理层面的约束，更有学者自身认识水平层面的约束。这些约束制约了经济史方法论体系的更新。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的发展路径表明，中国经济史学应该突破既有的方法论体系，建立更为科学、更为规范的方法论体系。

边缘学科是以两种或多种学科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学科，交叉学科则是两个或多个学科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学科。从语义学的角度考察，经济史更侧重于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交叉学科的规范来源于既有学科间理论、方法和手段的相互渗透。

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考古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交叉中逐步建立自己的学术规范的，不同学科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担当了经济史学的方法论功能，因此，中国经济史学是在不断“失范”又不断“规范”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学术体系的，规范过程仍是“现在进行时”形态。

一、中国经济史学的方法论问题

据赵德馨先生考证，现代型的中国经济史学论著最早出现在1904年，大学里最早出现部门经济史学课程授课则是在1910年。1932年，陶孟和创办中国第一个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辑刊》，大量刊登发掘整理中国经济史料工作的文章，于史学方法和经济学理念都有

创新，从而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热潮。^①在这一辑刊的发刊辞中，汤象龙提出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宗旨、目标、理论、方法、步骤等学科规范。中国经济史开始形成一个学科。1934年，北平社会调查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陶孟和继续主持工作，汤象龙、梁方仲等人也跟随陶孟和一同继续经济史研究。稍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辑刊》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继续发表中国经济史论文。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处于资料整理阶段，并附着于经济学。与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统制经济和自由经济争论的热闹氛围相比，这一时期的经济史学则显得暗淡、冷落。

新中国成立以后，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史方法论的制约日益凸显，西方主流经济学充当方法论的经济史研究几乎绝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为经济学的主导性方法论。在选题上则以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强调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心线索的内在逻辑关系。“所谓内在的逻辑联系，指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对它的发展和不变有着合乎逻辑的内在规定性。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地位的形成，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环境；中国近代半封建社会的持续，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种历史现象的分析，都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到这条中心线索上来。”^②这个提法具有哲学意义，更具有方法论意义，不但丰富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含量和内容，而且使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然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发展”过程本身就是“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塑造者，“发展”“不发展”不但表现为结果，而且表现为原因和过程。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发展”的理论取向和价值结构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为导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过程中新的矛盾的出现，西方经济学理论进入一个“百家争鸣”阶段，货币主义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等新的经济学理论先后成为西方经济史学的主流方法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

① 郑娟、梁捷：“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

②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国成立后,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的外交“一边倒”也导致在经济学理论引进方面的“一边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被疯狂输入到中国这个曾经自由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度,而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西方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则被挡在国门之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前沿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即使被翻译引进也是作为“内部读物”被当作批判的靶子。这些学术批判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学术意义式微,大多是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受压迫、受剥削寻找理论根据的。

同一时期,西方经济史学的方法论体系得到了更新。在美国经济学家群体中出现了以古典、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历史计量学有机结合的“新经济史学”,逐渐摆脱传统编纂经济史学的束缚,实现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伟大转向。方法论创新是学术创新的先导,这种转向不但拓宽了西方经济史学的学术视野,而且提升了理论解释力,成为美国、英国经济史学主流。^①比如,美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W.福格尔(Robert W. Fogel)运用历史计量学对美国铁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他首先假定美国西部当时不存在铁路,通过分别建立“存在铁路”和“不存在铁路”两种运输成本模型,利用当时的工业统计资料和数据,得出如下结论:铁路作为一种运输手段,尽管在美国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传统的观点下被夸大了,铁路并不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②

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界仍然沉浸在“如何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氛围内而不能自拔,历史学成为政治工具,经济史学则局限于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生产关系。

1978年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现实经济转型的需要促使西方经济学理论被大量引进,马歇尔、萨缪尔森、凯恩斯、弗里德曼、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大师的经典经济学著作被大量引进。厉以宁、吴敬琏等改革派经济学家成为新的经济思想的倡导者,吴敬琏与厉以宁分别以其分别在社会主

① 关于这一时期新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介绍,参见孙圣民:“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44~146页。

② Robert W. Fogel,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Railroad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Report of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2, no. 2 (Jun. 1962), pp. 163-197.

义市场经济方面的理论贡献和政策实践而分别有了“吴市场”和“厉股份”的美誉，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智囊。西方先进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经济结合的成功经验，极大地启发了中国经济史学者的学术反思，他们意识到中国经济史上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需要重新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必须建立在新理论体系上，单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属不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在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方面走到了前列，他在熟练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不断引进世界各国新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研究和分析中国经济史，并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果。这种学术转向具有跨时代的历史意义，近代中国经济史学从此摆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逐步建立起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导方法论的规范体系，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发展”获得了新的解释体系。

就经济实践形态来讲，近代中国是一种杂糅了各种封建主义因素、殖民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非典型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总体上已经具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化程度大为提高，各种经济要素及其运作已呈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比如，近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国家的贸易关系已经是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平等贸易关系；现代金融制度和货币制度已在不同程度上规范着近代中国经济的运行。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之所以相对落后，原因虽然复杂，但诸如制度要素、技术要素和管理要素等核心要素在地区间、行业间、部门间的不均衡发展是主要原因。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原始的物物交换（甚至没有交换的）经济形态并存；部门经济中科学的管理体制与陈旧的管理体制并存；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与统制经济的矛盾并存。总体上说，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发展”是区域性、部门性、行业性的结构性不均衡状态。现在可以断定，近代“革命史”范式、“意识形态”范式体系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所谓“经济侵略”造成的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如果“革命史范式”“意识形态范式”在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继续存在，近代中国很多经济现象则无法解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前进的真实动力也就无从觅得，长期争论的一些所谓“核心论题”还会长久争论下去，而最终不知所终。令

人欣慰的是近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已经逐步摆脱“革命史”范式和“意识形态”范式，开始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结构要素、制度要素、组织要素进行实证性剖析，而不再纠缠于一些“历史哲学”的主观判断。这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历史哲学判断”深刻地影响了并继续影响着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的学术实践。在既定的社会形态条件下寻找这个社会形态存在的合理要素往往成为经济史研究有意无意的学术宗旨和学术目的。

这种认识误区是把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哲学判断”当成了“经济史判断”。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把1840~1949年的近代中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判断，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这个判断不是“经济史”判断，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范式下的“历史哲学”判断。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半”是基于殖民地要素与封建要素在近代中国并存而设定的，不可能是经济史学意义上的“实证性”判断。如果这种判断是经济史判断，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因为它完全忽视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要素，而且这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正是承担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载体，承担历史变迁的新的生产力要素、组织要素和制度要素几乎全部存在于既定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之中，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半封建性质也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获得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解释，如果忽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不能沉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哲学”判断，而忽视基于特定经济条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研究。从更为广义的角度看，社会形态的历史哲学判断是历史学的广义方法论，是历史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而不是实证基础。历史学的学术场域必定要有不同范式的方法论体系进行指导，而不是一种方法论。我们不能被主流话语体系下的方法论体系所左右，因为单一的研究取向（research orientation）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研究课题。此即为门格尔所论“单纯一种研究取向，即使本身是完全正确的，若从我们的学科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的角度

来看，也是不够充分的”。^①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不应固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哲学”判断，而应根据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实践在理论抽象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在经济史学领域，那些固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定性命题的学者在解释特定的经济现象时往往陷入“意识形态陷阱”而不能自拔，往往不能得到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本质上就是他们忽视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研究所必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解释体系。“历史哲学”的社会定性与经济史学的社会定性是两个不同的学术范畴，二者的价值取向、理论方法和学术意义大相径庭。

“社会形态”概念意在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不同的历史层次、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样态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最核心、最根本的要旨就在于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囿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致，由不同的历史阶段构成，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形态演进。在对社会形态定性的理论研究中，剔除了大量偶然因素、舍去了活生生的事例，形成对历史发展客观逻辑的一种抽象，并不是对所有社会现象的汇总，^②即所谓的超历史的“历史哲学判断”。而对“活生生”的社会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制度体系的研究则是经济史学的主要任务，也是经济史学的基本功能。经济史学对社会性质的定性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要素实际运行情况的考察，而不是基于“超越历史”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历史哲学判断”。吴承明先生也明确指出，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一种历史哲学命题。在经济史上，没有奴隶制者有之，没有封建制者有之，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者更有之。因此，经济史研究不应局限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既定“历史哲学”判断，在既定“社会性质”框架内寻求对经济实践活动的解释，这种本末倒置的学术路径即使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我们也要坚决避免，因为政治的“可能性”肯定要建立在经济的“可能性”基础之上。对特定社会经济的运行条件、运行规律进行系统的、实证性的研究，才是经济史学的应有要义。正是由于

① [奥地利] 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著，姚中秋译：《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② 王伟光：“‘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笔谈：深入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经济史学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作用,学术研究管理者应该突出经济史研究的基础地位,在学术科目设置时,不应轻视经济史学的基础地位,经济学史学理应处于比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更高的位置,其他社会科学的显学地位绝对不能建立在牺牲经济史学基础地位之上。但事实往往是经济史研究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成为经济学的附庸,被经济学边缘化。这就是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学术创新举步维艰的根源所在。

经济史研究存在历史学和经济学两种解释范式,它们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作用不同。在实证研究中,经济史研究既需要历史学分析,也需要经济学分析。在这两种方法的运用中,不能说历史学分析“不理性”,不具备解释力,不能得出正确结论,因为描述本身就有一个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不能因为其理解解释力偏弱就低估它的学术功能。也不能说经济学分析就必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其一,如果理论选用不当,就会造成结果的偏差,甚至完全与事实相反的结论;其二,对历史知识的缺乏也会导致经济学分析“走火入魔”,不知底里。近年来,经济史领域日益增多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由于在构建模型时经济史基础变量的选取上出现偏差,往往造成结论的荒唐。吴承明先生也指出,“采用计量模型并不是研究历史最好的方法,它将复杂的社会关系都简化为函数关系,已属失真,又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不能说明其来龙去脉”。^①

因此,我们在两种范式的选择上不能厚此薄彼。完美的经济史学解释体系应该是这两种范式的综合利用,或者说打破这两种范式的边界,经济史学范式本身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只是根据所研究对象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功能取向不同。经济学范式与历史学范式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就应该是两个学术功能的结构性综合体现。

现代化范式、制度学范式、全球化范式都在历史研究中得到了运用。随着历史学的整体性推进,经济史研究也突破了只注重生产关系研究的瓶颈,价格研究、经济周期研究、货币研究等成果显著。这些成果的取得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创新。然而,这种学术创新在目前并不具备普遍意义,

^① 刘维维:“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之源:访经济史学专家吴承明”,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11日。

因为学界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质性掌握并不具备普遍意义，而主要来自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研究的“偶然行为”。这种“偶然行为”的出现并不“偶然”，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原因。一方面，是经济学的强烈政策取向，导致经济学家趋之若鹜，而经济史学对当前政策解释力偏弱，经济学家不愿意过多地涉及经济史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史研究“经济绩效”过低，无论是课题数量还是课题经费都远不能与经济学相匹敌，深谙“成本－收益”之道的经济学家自然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史研究上。这就造成经济史学研究人群的“主观性”流失。而那些只具备史学理论知识的经济史学者则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沿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进行研究。历史学方法虽然无可厚非，但也不能讳言存在缺乏理论深度的弊端。这就造成在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者“能”而“不作”和历史学者“作”而“不能”。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与经济史学的备受冷落是经济学家的“投资偏好”在作怪。

经济学家的“投资偏好”来源于学术管理层的“政策偏好”。查阅历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历史学”科目中还是在“理论经济学”科目中，经济史学课题设置均屈指可数，而经济学选题则“不可胜数”。相信经济史学从业者，对这个现象体味尤深，也颇感无奈。

学术管理层的政策取向促成了经济学的“显学地位”，强化了经济史的“冷门地位”；也促成了经济学的“门庭若市”和经济史学的“门前冷落鞍马稀”。

这种现象导致经济史学对经济学的“史源”功能和经济学对经济史学的“方法论功能”相互弱化，即经济学家埋头制造模型，而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经济史学家在“口若悬河”地解说经济史而说不到“道道”上。可以说，经济学与经济史学“不相为谋”局面的出现，学术管理部门责无旁贷。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的学术分野表面上看是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不能相容；从实质上看，则是国家学术管理层对经济史的学术功能认识不足而导致的政策取向的偏差。解铃还须系铃人，这种局面的改观必须依赖国家级别的学术管理层正确认识经济史学的学术功能，加大在经济史学研究的政策投入，堵塞经济史研究人才的主观流失。经济史学的学术功能绝对配得上其显学地位，一方面，它是经济学理论的来源，具有理论功能；另一方面，它是对过去经

济实践的历史总结，具有史学功能。

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史研究的主流方法论存在于欧美先进的经济学范式之下，其学术成果无疑比我们更为丰富，见解更为独到，至少脱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自怨自艾、故步自封、无所进取，反而应该努力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向西方新经济史学靠拢，建立与西方经济史学者平等的对话机制和学术平台，努力完成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成功转型，从而提高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水平。这也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史学本义之所在。

经济史学是一个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和鲜明时代特色的科学，包括经济史在内的人类历史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隐秘空间和未知世界。对于真实的历史，我们仍处于触摸的阶段，因此对于历史老人我们理应采取敬畏的心态，但敬畏并不是敬而远之，而应该是“敬而近之”。在探索经济历史的隐秘时，如果没有理论工具的借用，我们面对历史上大量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现象将无所适从，看到的永远是现象而不是规律。当然，借用经济学理论工具研究中国经济史，并不是否定传统历史学的宏观叙事功能、时空逻辑功能和整合功能。在吸取其他有效工具的同时，历史学的这个传统还要保持下去。

二、近代中国宏观经济史学述评

根据所运用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对经济史的解释可以有多种范式，可以建立多种解释体系，基于此，关于近代中国宏观经济史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以民国时期经济学家群体为主，是一种关于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可谓著述浩繁，精品迭出，对当时的现实经济政策发挥了不可多得的经济智囊作用。

第二个时期，以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罗斯基（Thomas Rawski）《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为标志，中国近代宏观经济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拓展，表现为国内外研究互动、长短周期研究结合等特点。郑友揆的著作开启了近代

中国宏观经济学的先声，从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出发，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的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证的梳理。罗斯基的著作则更为全面和具体，他认为，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中期，中国制造业、农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和固定投资规模取得了不可忽视的巨大进步，这种进步甚至可以与同时期日本的发展速度相媲美。这种与传统相悖的学术观点随即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华盛顿大学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认为：“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必将激起人们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的特征做出大的反思。”康奈尔大学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的评价更高，认为罗斯基这种根据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的独创性研究，第一次全面综合地提供了20世纪初期中国的历史面貌。然而，来自学界的评论并非都是溢美之词，威斯康星大学赵冈教授认为罗斯基对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增长的论证缺乏充足证据，即如果把罗斯基低估的粮食产量的增长率从1936年倒推至1906年，则人均只有320斤，不能满足起码的生存需要。而黄宗智则对罗斯基关于中国农民收入提高的论断提出了尖锐批评。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蒂姆·赖特（Tim Wright）对罗斯基关于开滦煤矿工人工资变动反应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变化的论断提出了不同看法。

对1910～1936年中国货币供给总量的估计是罗斯基著作的另一个突出贡献。该项货币总量估计涉及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结构最全，并结合现代货币经济学理论对其进行了狭义货币供给M1和广义货币供给M2的分层。然而，对于这项中国近代货币供给估计存在的不足，罗斯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这项估计“所显示的结果含有不少难免武断的地方，并且借助的资料也往往少有说服力，尤其是对早期资料和涉及外国银行在华业务时更是如此。然而，可以确信的是，这些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本研究所涉及时期中国货币存量的规模、组成和增长率方面的合理近似值”。^①这个评价一方面指出了由于原始资料本身的限制难免导致估计有失实之处，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个在大量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货币供给估计，无论在规模总量上还是在增长水平上都具有某些合理性。从这些话可以看出，罗斯基对这项关于近代中国货币供

^① [美] 托马斯·G. 罗斯基著，唐巧天等译：《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页。

给的学术探索进行了自我肯定。

即使抛开这项估计的合理性不谈,单是罗斯基先生的学术勇气就值得称道。众所周知,中国近代货币制度的复杂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可以说纷繁庞杂、无所不用其极。贺水金女士曾经对1933年“废两改元”以前的中国货币结构进行过总结,她认为:第一,传统性货币与近代性货币并存;第二,中央、地方政府发行的货币与非官方发行的货币并存;第三,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并存;第四,货币流通的区域性与区域内货币流通的多样性并存。简单地说,就是本位不明、主辅币不清、发行权分散、形态多样、种类繁多。^①对于这种货币结构的货币总量进行估计,笔者甚至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罗斯基先生就把这种“不可能”的事情付诸了学术实践,实属难能可贵。

正如罗斯基本人所指出的,这个估计“难免有不少武断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估计进行修正,保留估计中的合理成分,剔除其不合理成分,必将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的重要责任和任务。

刘佛丁教授从市场发育程度、农业发展状况、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周期性波动、资本积累等问题,对罗斯基这部学术著作进行了全面评析,对罗斯基过分夸大战前中国经济增长态势的结论提出质疑。^②刘佛丁、于建玮、王玉茹合作的《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这一时期论述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学术专著。其突出特点就是把经济周期纳入近代中国经济增长体系。他们通过对物价指数、对外贸易指数、生产性指标等经济运行的核心指标的考察,指出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平均期限为25年左右的中长期波动。从19世纪70年代中国近代化起步以后,起码经历了两个完整的经济周期。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10年代中期为第一个周期,20世纪1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为第二个周期。根据各有关数据的平均值和对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判断,将经济周期的下转折点确定为1887年、1914年和1936年;而将周期

① 贺水金:“论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币制紊乱的特征与弊端”,载《史林》1998年第4期。

② 关于对罗斯基著作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刘佛丁:“对20世界前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新估价——评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增长》”,见《近代中国》(第3辑),1993年;刘佛丁、王利华、王玉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经济——评美国学者近年来关于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讨论”,载《南开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

的上转折点确定为 1905 年和 1931 年。基于内生增长机制与外生增长机制，刘佛丁等把中国近代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成因归结为五点：“一、技术和管理制度的进步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两次繁荣的决定性因素；二、投资规模的扩张和收缩是经济繁荣衰退的直接原因；三、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影响；四、政府经济政策和行为的作用；五、政局的相对稳定是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①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电力普遍应用和生产设备的更新以及与之适应的管理制度进步，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二个周期的上升期的主要动因。在经济史学中，技术要素和制度要素必然要通过可以量化的要素表现出来。而投资规模和国内外市场变化既是近代中国经济波动原因，更是近代中国经济繁荣与萧条的结果。至于政府经济政策和行为以及政局的相对稳定都是经济发展的必备要素，并不是形成经济波动的原因。

伍艳从企业近代化的制度层面、货币供给层面和政策因素层面对近代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成因进行了剖析。她认为，近代公司制度的引进和不断创新是 1914～1936 年中国经济有规则周期波动的决定因素。^② 这是一种典型的制度经济学的解释范式。但是，制度创新在经济起步阶段虽然可以起到促进作用，但一旦经济起步且进入上升轨道以后，制度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对既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保障和维护。近代中国公司制度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转变为稳定经济的要素，而不能成为解释经济波动的因素。在既有的公司制度前提下，1934 年中国经济全面照样进入萧条，因此公司制度创新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周期波动。伍艳还提出近代中国政府“顺周期”和“逆周期”的政治运作可以加强经济短期波动幅度的观点，这与杜恂诚教授提出的近代中国经济运行的政治周期相契合。^③ 但是，政治周期仍然需要要通过经济政策表现出来，而经济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传导则仍然需要经济变量的实证解释。

上述研究涉及资本主义市场水平、商品化程度、货币化水平、经济全球

① 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3～149 页。

② 伍艳：《1914～1936 年与 1953～1976 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比较研究》，西南财经大学 2000 年硕士论文。

③ 杜恂诚：《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8 页。